

动，它往往可以决定出一天的趋势。我说它沉重，是因为即使我离开电脑、打算把正在进行的小说暂时丢在一边时，我发现，它并不能真正地离开我，它一直就“隐身”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无论我漫不经心地做家务，还是靠在沙发里漫无目的地翻看闲书，或者与什么人说着可有可无的话，只要有什么敏感点与它发生感应，它立刻就会像个小人儿跳到我的意识中，对我指手画脚，我就这样被它“控制”着，貌似神不守舍的游离状态。直到第二天打开电脑，我继续写作的时候，它才安静下来。

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，觉得精神是有些不大“正常”的。现实中的七零八碎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细枝末节，我统统是看不见的，无感的，那些年我的脑子始终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当然也可以说，我那些年的“看不见”或“无感”，或许是一种本能的“选择性失明”吧。

现在来看，这也许算是我的某种生活阅历的“损失”。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觉得，人是被现实社会训练甚至教训出来的，是“南墙”撞出来的，而我的“神”那么多年活在另一个维度里，怎么能不“缺失”现实的经验呢！

至于你说的“好状态”，年轻时我并没有什么自觉自查，本能居多。现在有了一点阅历，

可以从一个旁观者角度、站在自己之外看自己了。总的来说，尽量做到少言讷语，心如明镜，应而不藏，以无为行有为吧；同时，不做做不到的，只做做得到的，接纳自己的局限，接纳一切可能发生的发生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氛围，在你印象中是怎样的？

陈染：那时真的是中国文学、艺术以及中国文化最为开放蓬勃、最为辉煌灿烂的时刻。历史不会忘记！虽然，我们的历史观往往有一种特点，在某个局部的不太长的历史阶段，历史是“政治的历史”，但是放到以百年计、以千年计的时间长河里，历史终归会展现它真正的面目。历史不会总是某个阶段需要的“政治的历史”，文学也不会总是某个阶段需要的“政治的文学”。用时间长河的历史看待文学，我相信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不会被历史遗忘。

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，大约在1982年考上大学之前的两年，我才开始阅读文学，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。读书的眼界，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认知，而人与人层面的不同，大多是由认知决定的。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孪生姐妹，由于读不同的书，可能形成的是完全不同的思想。当然，我

我愿意去挖掘和展现人性中更永恒一些的东西，使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时都能得到感应。

这里说的读书，不是指应试教育下学校里的那种读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当时你已经开始读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了，难怪你在思想上早熟、精神上聪慧了。

陈染：读书对写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、浑然一体的，是一种底色。但倘若把某一种具体搬到自己的创作中，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局限。

到现在我也不愿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太具象、刻意去强化某种哲学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时代痕迹。这可能与不同作家的文学价值观有关系，有的作家故意强化时代感，展现特定的历史情境，比如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写“文革”、写“知青”，我觉得各有利弊。比如你要强化“文革”背景，现在的小孩看了可能就不太理解。

我愿意去挖掘和展现人性中更永恒一些的东西，使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时都能得到感应。时代不断变更，而人性亘古如斯、源远流长。当然，即使是人性，也会是带有时代痕迹的人性。

女性写作与日常生活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写作之外，你一辈子的工作是图书编辑，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到退休。你对这个工作感觉怎么样？